

怀念谢璞先生

邓跃东

谢璞先生,我是24年前的春天里收到你的来信,那时我20岁,你还在省文联主席的任上。我倍受鼓舞,又深感不安。这种复杂的心情延续到了现在,以至于一直未能给你回信。今天,我提笔给你写信,尽管你再也看不到了,我决心还是把信写好,包括每个标点符号。这是春天的回望,季节轮转,人驻春天!

收到你的来信时,我在陕西的黄土高坡上行军。我是一名通信兵,每天在野外爬杆架线,夜里住窑洞,生活枯燥,我坚持用写作来调剂日子,给青春装饰绿意。我写了很多稿子,寄出后都石沉大海,我苦恼极了。我想到了你,你是家乡洞口县的文星骄子,从小就听老师讲你的不凡经历,从一个山乡小学教师写成全国著名作家。我从未见过你,但我看到了光亮,就把写出不久的中篇小说《回乡》寄给了你,当然不敢期盼出现什么奇迹,继续写着其他的稿子。三个月后,却惊讶地收到了你的来信,《小天使报》的信封,碳素墨水飞舞了一页方格纸。你告诉我,稿子看后转给了《湖南文学》杂志的编辑。不久,我收到了杂志社的信件,编辑提出了几条修改意见。我觉得几乎推倒重来了,可见我的基础之差,也让我清醒了许多,不一定改得出来,就放弃了。但是,我仍然高兴,我是远方的无名小卒,你竟挤出时间关注了我,还是亲笔信。这足让我引以自豪,后来我很多次向文友炫耀,看,谢璞老师给我回信了。他们眼红着呢,怎么说都是一种爱意,偏落在我身上!

我沾沾自喜了一段时间,也想给先生回一封信,出于对前辈的礼节,但是不久我调离了黄土地去了西安,把事情耽搁了。后来想起这件事,但我很久没有写作文学作品了,新闻工作让我焦苦不堪,我没有勇气写这封信,毫无文学建树。

想不到,这种怯弱和空虚持续了十多年。我觉得犹在昨天,心心念念,好像落下什么没做好。其实,我是惦念着心仪已久的文学情人,于心不甘,却又无可奈何。然而,在我卸甲归乡时,很多伴随了我多年的书籍和器物都没带,却把这封信带了回来!怎不是,那是我初心的见证!

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?一切缘于写信人本身的力量!

转业后的这十年里,我一直在山乡修建公路,业余写作散文,取得一些成绩。我曾想过给先生写信,谈谈想法,盼望赐教,但还是没有勇气,觉得十年风尘微不足道,要走近,还是去读先生的书吧!那本散文集《珍珠赋》是上高中时购买、带去部队又带回的,我总是婆娑了又婆娑;后来在旧书摊上淘得小说集《血牡丹》、儿童文学集《芦芦》;去年市里编辑邵阳文库,我也得到一本《谢璞的文学世界》,由此进入了一个绚丽的世界。

记得五年前,我到长沙出差,夜里路过八一一路227号,看到省文联的牌子,一下想起先生就住在这个小院啊!我在门口徘徊了很久,却没有勇气进去探访,最后悄悄地走开了。我跟先生因文交际,怕是没有缘分会面了,偶尔看到一些图文,先生年过八十,深居简出,很少参加外界的活动。我想,安静写作吧,不辜负先生的愿望就是最大的尊敬。

2016年秋天,我在省文联的《创作与评论》杂志上发表了一万多字的作品《捕伏》,产生一些反响。后来有朋友告诉我,这篇稿子的责任编辑谢然子就是谢璞先生的女儿。啊,这么巧合!

我心起涟漪,试着与谢然子联系,并发去了当年先生来信的图片。然子看了会很开心,想不到我会保留20多年。后来她告知,回家向先生提过我,但早没印象了,先生翻看了我的稿子,说故事精彩、人物语言活脱。然子复述如临其境,稿子里几句家乡骂人的话惹人哈哈大笑,因为她一直是听着先生这么骂人的,可见先生的直率性情。

去年,我有机会见到了然子,但是仍没勇气去见先生,我就通过她了解先生的讯息。我想,在天气回暖的时候给先生写封信吧,完成24年前的那个念想,这种方式自然平静,没有拘谨和担心。

我是这样思量着,直到那天夜里十一时许,突然在微信上看到然子发出的信息:3月6日下午2点33分,我最敬重的父亲走了……

我瘫倒在床头上,半天才晃过神来。我觉得有事做了,该写信了!

父亲的书瘾

刘玉新



往今来,讲得那样神采飞扬。

父亲最喜欢三国的“三”字,他常常挂在嘴边的是“桃园三结义”“三气周瑜”“三英战吕布”“三分天下”“一计害三贤”,一直讲到“三国归晋”。如果中间不是有人打断或是抽烟喝茶,父亲会一直滔滔不绝地讲下去,那副烂熟于胸的神情常常让我感动不已。

父亲这一生读的书并不多,如果单论遍数,恐怕就数《三国演义》

了。《红楼梦》他只读了一半就再也读不下去了,他说没读懂。《水浒传》读完了,但他不喜欢那个死的死、伤的伤、逃的逃的悲剧结局。

在父亲的眼里,他是把《三国演义》当成了历史,以一介农民特有的思维方式在解读、思考或者探问。父亲前几天对我说,有生之年,他一定要走一趟白帝城,看看先帝托孤的地方。我知道,在父亲的心里,一直是偏向蜀国的。

◆书与人

听父亲说,他解放前读过两年私塾,记性特好,至今还能一口气把《三字经》背下来。解放后他又读了三年半小学,在村里算是认得几个字的人。

他最喜欢读的书要算《三国演义》了。小时候,记得他的枕边经常放着一本老版本的《三国演义》,泛黄的皮纸,线装,封面已经掉了一半,里面全是毛笔小楷。字很小很小,但一笔一画却十分清晰。每天收工回家,吃完饭,他总要借着昏黄的灯光,读上几页,有时半夜了,他还点着个煤油灯在读。

这几年,父亲的视力差了些,但仍喜欢读书。有一夜,我在门缝里悄悄一看,父亲戴一副老花镜,怀里拥着一床被子,就那么歪在床头,一看就知道又在读《三国演义》。那双粗糙的大手一只托在书底,一只五指伸开,轻轻按住书面,读得十分专注。

农家的雨天,没法下田干活儿。父亲就正儿八经地搬把椅子,坐在桌子边,一读就是大半天,而且这么多年来百读不厌。我们兄妹几个就常笑他读《三国演义》读上了瘾。父亲并不答话,在淅沥清脆的雨声中,依然读得那么津津有味。

父亲每次到我这里来,只要稍稍有点空闲,必定从我的书架上抽出《三国演义》,如饥似渴地读起来,哪怕只读一晚上,哪怕只读短短的几页。

去年的腊月二十,我把父母从

乡下接来过年,本想好好地陪他们玩几天,打打牌,逛逛街,再给他们买几件衣服,顺便也好让他们看看小城的街景。哪里想到,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还没起床,就听见客厅里父亲搬动椅子的声音。妻在被子用肩拱了拱我说,你去看看,是不是爹昨夜没睡好。我披衣起来一看,父亲坐在椅子上正捧着一本厚厚的《三国演义》呢!我回来悄悄地在妻耳边说,爹的书瘾又犯了。

父亲读《三国演义》,读得很上心,也读得很精细,他从不讲速度,一行行地慢慢读,有时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读,读到特别精彩的地方,他绝对要回过头再读一遍。他对三国那一班文臣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,好多次他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“诸葛亮骂死王朗”“秦宓难倒张温”的故事,讲着讲着就背出一大段来。父亲读《三国演义》还喜欢对着地图读,找隆中,找荆州,找西川。孟获大概占据的是云贵一带吧?听到他一个人自言自语,我们就忍不住在一边偷偷地笑。母亲就悄悄地说,看你爹这个书呆子。

年前年后,我们一大家人在一起,读书看电视,话题不知怎么就扯到了《三国演义》。一说到魏蜀吴,父亲的话匣子就打开了,仿佛成了“话说三国”的栏目嘉宾。他讲三国,最喜欢从“话说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开始,像个哲学家在讨论相对与绝对的关系,又像个政治家在分析天下形势,纵谈古

◆学林漫录

曾仲珊师校点的《急就篇》(上)

易重康

曾仲珊先生是我的老师,也是我的领导。

1950年7月,我考入湖南省立六师,曾师正在这里教语文,不过不教我们班。但我这人,天生喜欢有学问的老师。曾师就读于钱钟书先生在《围城》里写过的那所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,毕业后即留校任教。故我断定,曾师绝对是个很有学问的老师。可惜,天不作美,我还来不及与曾师谈上半句话,曾师却调洞庭中学做校长了。交臂之失,很使我遗憾。

1953年7月,我六师毕业,分配在附小。可凳子没坐热,另一所小学却要我。但也没吃几口饭,武冈二中又调我承乏担任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学。武冈二中就是曾师做校长的原洞庭中学。我无缘做曾师的及门弟子,却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个每天都可以向曾师请教的小学徒。皇天到底不负苦心人呀!

在二中,有两件事难以忘怀:

第一件,曾师一个人来听我上课。我猜想,是什么老师或学生向他反映了我的一些什么,他是有意避开别人来了解我、帮助我的。听课之后,当然也谈了些鼓励我的话。但临走时,却轻轻地提出:“课堂里你写过一个大大的‘贰’字,再写一遍给我看看。”我很快写了,他笑说:“写错了呀!”我改写一遍,自信是对的。他看了,仍摇摇头说:“也不对。”我想再改。他制止了,说:“回去查查字典吧。”这件事,曾师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提起过,可我至今记在心里。更重要的是我从此养成了勤查字典、词典的好习惯。良师育人,润物无声呀!

第二件,时间到了1956年5月,我与语文组老师一同听曾师讲简化汉字。他说:繁体的“從”字简去了“走”,保留右上的两个“人”字。一前一后,十分清楚地表现了“从”字的正反两个意思,对前一人说,是“带领”。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上“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”一句的“从”便是“带领”。对后一人说,是“跟随”。《项羽本纪》上“张良是时从沛公”一句的“从”便是“跟随”。他还说了一个“驢”字,这是个形声字。“马”旁表形,“卢”旁表声。简化字的“驴”,声旁作“户”,不能表声了。可曾师说:王实甫《西厢记》第五本第三折里有句骂人的话叫“木寸马户尸巾”,“马户”合拢来是“驴”字。可见至迟到元代,“驴”字已公认为

“驢”字的简化了。这叫约定俗成,必须承认的。

曾师把简化汉字讲得如此有理有据,如此有内涵,不但引起了我对简化字的神往,而且还让我深深地意识到咱们汉字的神圣。数十年后,我编写《文字学教程》,并一度对“俗字”的搜集与整理产生了兴趣,起点都在这时。可惜,没有多久,曾师又调走了,调去省教育厅任语文教学研究员了。再次分手,伤感倍增,奈何奈何!

此后,云水相隔,我们见面的机会便很少很少了。但曾师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,如《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》上关于《诗经》某些词语的训诂问题,又如《中国语文》上关于古代汉语的使动问题,我都认真地学习过,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故有时候,我简直想骄傲地大吼一声:曾师绝对是咱们国内深有修养的语言学专家之一!

果不其然,我的吼声,不久就有了回应。1991年春,邮局寄了一部书来。拆开一看,《急就篇》,语言学专著,校点者,曾仲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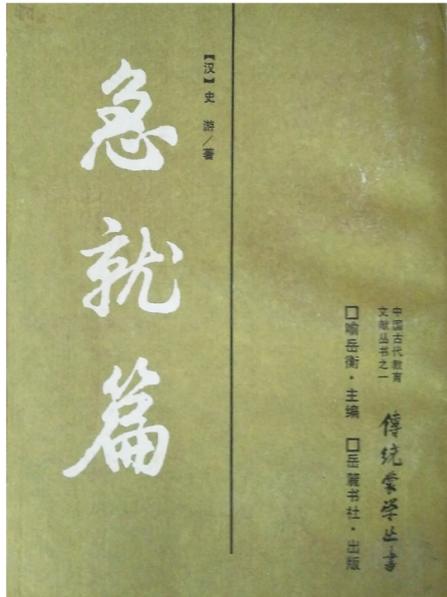
《急就篇》,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撰,是一部供学童认字、习字的蒙学课本。

《急就篇》问世之前,社会上流行过好些认字课本,汉人取长补短,编了一部三千三百字的《仓颉篇》。《急就篇》好像吸取了《仓颉篇》的经验:一、剔除了一些“塾师失其读”的“古字”(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集中保留了两千一百多个常见字,既容易学,又十分有用。二、采用七言韵语(有少量三言、四言的),读起来上口,记起来舒心。后出转精,故《急就篇》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捧,在我国古代启蒙教育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但是,历史是发展的,社会是变化的。到了唐代,本来不过是一部供学童认字、习字的蒙学课本,却逐渐变成了一部几乎让人很难看得懂的“古书”了。怎么办?初唐颜师古首开先河,给《急就篇》作了注解。颜是把号称难懂的《汉书》注解得人人叫好的著名学者,以杀牛之刀杀鸡,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

颜注是成功的,但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。延及南宋,一位曾以《困学纪闻》等杰构横扫一代的著名学者王应麟,继武颜氏,进一步为《急就篇》作了补注,锦上添花,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。

一代一代,变本加厉,作为蒙学课本的《急就篇》终于被打造为一个学术的焦点,还进而不



期而然地成为一门“显学”了。

有清一代,大学者孙星衍、钮树玉、龚自珍、王国维等均研究过《急就篇》,并各有建树。但是,民国以来,继续对《急就篇》的研究持有高昂热情的学者,似乎就鲜有所闻了。

曾师校点的《急就篇》,岳麓书社1989年出版,小32开本,以繁体字直排,计29万字。它以商务印书馆《丛书集成》本为底本,以浙江书局《玉海》本为参照,偶尔提及“黄氏曰”,乃北宋黄庭坚之说。每条“校点”,先标明待校点文字的行数。然后,引出待校点的文字,前后加括号。最后加“珊按”,提出校点的意见。曾师的校点,主要是针对“颜注”和“王补”的,共七百二十条。每一条均以小宋体字直排在同一面的天头内。十分醒目,极便查阅。

什么叫“校点”?顾名思义,“校”就是校对,“点”就是标点。为什么要校点?众所周知,古人读书扎实,往往能熟读成诵。故由此而在心理上形成定势,凡引前人文字,一概不查对原文,也不详注出处。后人阅读,困难重重,校点工作者给读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麻烦。

如103页6行,王补曰:“无终有孟乐。”无头无尾的五个字,它出自何人之手?写在何书、何篇之中?王补均未透露半点消息。幸好我们的曾师读书读得比王还精细三分。珊按:“见《左传》襄四年。”

我幼时读过《左传》,后来为文,引用《左传》文字的频率也比较高,但一见王引五字,简直如见天书,不知所从。不是曾师的指点,要找出这五个字的来源,真不知要耗费多少宝贵时间呢!